

CULTUR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胡惠林 陈昕 单世联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主办

文化战略与管理

第2卷

CULTUR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胡惠林 陈昕 单世联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主办

文化战略与管理

第2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化战略与管理. 第 2 卷 / 胡惠林, 陈昕, 单世联主
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640 - 5

I. ①文… II. ①胡… ②陈… ③单… III. ①文化产
业—中国—文集 IV. ①G1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6776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熊 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文化战略与管理 第 2 卷

胡惠林 陈 昕 单世联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52,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640 - 5/G · 1626

定价 42.00 元

目 录

发展论坛

- | | |
|------------------|----------|
| 关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 章建刚 / 3 |
| 文化产业的社会境况：竞争中的解释 | 单世联 / 17 |

现代新义

- | | |
|----------------|----------|
|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 陈力丹 / 59 |
| 古史新义与革命逻辑 | 兰 溪 / 82 |
| 现代思想脉络中的红学 | 田 丹 / 97 |

城市文论

- | | |
|------------------------------|-------------------|
| 两个城市的故事：北京、上海与五四一代 | 拉那·密特尔，单世联译 / 133 |
| 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以广东南海区为案例的分析 | 刘根勤 / 149 |
| 青岛中山路的衰落成因及复兴之道 | 唐月民，刘 庆 / 162 |

产业分析

- | | |
|-------------------|-----------|
| 网络视频产业研究：垄断的结构与价值 | 周 笑 / 173 |
| 广东省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分析 | 刘 毅 / 182 |

县级广播电视台公共服务财政保障
机制研究——基于湖北省县级广播电
视机构财力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一 江 / 190

国际观察

当代西方文化政策价值取向及政策选择
国外运动、娱乐与旅游政策探析

任 琪 / 209

吴承忠,田 昽 / 218

区域扫描

学术·社会·文化:对台湾地区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沈望舒 / 229

新著评介

儒家文化自觉与文化信仰——兼读《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
——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

江 凌 / 243

漫长的革命与文化观念的重建

——读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

林 健 / 251

本刊稿约

本刊编辑部 / 261

CONTENTS

Development Forum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Zhang Jian'gang / 3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Competition Theory Shan Shilian / 17

New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May 4th Movement and Chinese Journalism Theory Chen Lidan / 59
The New Meanings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Logic of the Revolution Lan Xi / 82
Redolog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Ideology Tian Dan / 97

Urban Culture Forum

A Tale of Two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and May Fourth Generation Rana Mitter / 133
Path Selection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A Case of Model of South China Sea Region in Guangdong Liu Genqin / 149
The Decline Cause and Revival Method of Zhongshan Road in Qingdao City Tang Yuemin, Liu Qing / 162

Cultural Industries Analysis

- The Monopoly Structure and Value of Online Video Industry Zhou Xiao / 173
- An Analysis on Financial Investment of Guangdong Cultural Undertakings Liu Yi / 182
- A Study on Financ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or County Level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Organizations Yi Jiang / 190

International Observation

- Value Orientation and Policy Option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al Policy Ren Jun / 209
- A Study on the Sports, Entertainment and Tourism Polic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Wu Chengzhong, Tian Yun / 218

Area Scan

- Academy, Society and Culture: A Close Look and Thinking of Taiwan Culture Shen Wangshu / 229

New Book Review

- The Confucian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Beliefs Jiang Ling / 243
- The Long Revolu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cept Lin Jian / 251

Notice to Contributors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 261



文化战略与管理 第2卷

Cultur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Vol. 2

发展论坛

关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

章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732)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含义被人的全面发展所代替;传统的价值观被全面重估;文化生产与表达越来越成为激烈国际竞争的最后王牌。而政府不断创新的文化政策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变得越来越重要。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而人的发展首先并最终表现为对话的日益频繁和文化创造的兴起。以人为本的强国战略必然是以文化发展为主轴的。这个主轴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而要在这两个方面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文化体制改革。这三点构成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主轴。

关键词: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章建刚(1952—),男,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美学、艺术史、文化发展理论、文化产业。

收稿日期:2013-05-20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是文化强国、文化发展,会议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国家层面上,文化问题第一次明确地和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对这一政策方针再次予以确认,并将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推进这一进程的开端。这标志了党和政府对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高度自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构建应该被提上日程。对此我们有如下思考。

一、全球化、现代化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的机遇

我们讨论的是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既是对国内各项事业和产业发展的

协调,又是对国际环境的策略应对。尽管最终战略的形成与多角度的战略性思考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准备性过程,但战略本身所强调的全局性、目标及实施手段等基本元素是所有战略思考从一开始就需要具备的。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对现代化、全球化这些人类历史大趋势的理解中,发现它们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怎样的要求,提供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一) 发展含义的变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一切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现代化曾被从技术的角度上作简单的理解。现代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都是通过工业、市场和城市表现出来的,因此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发展起初就是个(经济或GDP的)增长问题。然而随着世界各国尤其“南方各国”走上发展的道路,人类学的思考被越来越多地带入讨论,增长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在不同国家里,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文化因素相关。反之,已有的增长都是发生在西方国家里的,这里的增长只是在他们特定文化历史中的一种探索。经济增长有不同的道路。在跨文化背景下,增长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印度籍知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选择与发展理论是近年来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的一个代表。他强调以“自由”定义“发展”。自由是用“可行能力”(capability)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单纯的“收入”界定的。^①在阿玛蒂亚·森那里,可行能力即参与发展(首先是经济活动)的实际能力,它往往通过教育形成,并由医疗条件加以保障。生活质量不仅强调充分的物质消费,也强调幸福感。这样自由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政治权利或一般意义的行动自由,而是可能成为经济学加以观察与探讨的对象。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发展就是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抽象地说,现代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次大变革,经济增长同时促进社会制度的变迁,也必然促进人类文化的变化。这样,传统国家不断向现代国家转型。所谓传统国家就是更多依靠暴力或专制进行管理的国家,而现代国家则是更多依靠契约和协商进行管理的国家。在现代国家中,与政府同时相伴而行的还有媒体和公民社会。

现代国家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公民国家认同与凝聚力形成的过程,是国家管理体制不断创新调整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时生成、相互调节的过程。这时,经济基础单方面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国家的发展必须能实现全面统筹的发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也许还有生态)各个维度都必须在变革、调整中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国家结构的复杂性要求全面协调整合,要求在功能运作上有效率与可持续。这就是发展对上层建筑、国家制度层面不断变革的要求。

^① (印度)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观念的现代化促进了文化发展。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人们看待、评价世界的方式,即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对传统的价值进行重估。

人类历史上,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曾经是借助暴力进行统治和交往的。这时的文化是苍白的,作品数量稀少,语言表达隐晦。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语言进行沟通,尽管是出于各自的利益,是激烈的讨价还价,也掺杂着投机和狡诈,但与动辄大开杀戒相比,这毕竟是更文明的方式。人类的文明始终是由语言及其符号表达所负载的。现代文明比前现代文明有更多的文化含量。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文化表达充分的国家的分配结构会比文化表达不充分的国家要合理;而在文明之间,由于语言沟通更困难,因此暴力的使用会更多。所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会经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是启蒙。

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趋势开始超越现代化。现代化造就的丰裕社会中,富裕了的消费者的消费偏好逐步从物质产品向文化产品偏移。工业再一次把教育的因素带给了工人阶级:产品更加美观,工作环境更加人性化,员工得到更多培训,城市景观带上更多文化表达。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①那时,他对使用“后工业时代”的概念还略有踟躇,而今天,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先见之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先后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对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正面界定,也有一些学者把“后现代”称为第二次现代化。这时,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有60%以上,甚至75%的增加值是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这种发展趋势让发达国家重新调整其国家战略,调整原有的社会制度和公私部门的界限,鼓励产、学、研之间更多开展合作,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在这种大趋势之下,人们看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正所谓高技术与高文化的联姻。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国不仅实体经济(如航天工业、汽车工业)和虚拟经济(金融业)都较为强大,其文化产业如电影、出版及网络在线服务等也十分强大。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在其全部外贸产品中占据数一数二的地位;美国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更是显赫,连欧洲国家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和威胁;美国电影无可置疑地覆盖了全球最多的银幕,并赢得了最多的票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政治学者谈论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来。现在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思考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其文化本身的发展问题。

(二) 全球化是所有国家发展及文化发展的共同环境

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而全球化则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环境或条件。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也许最终会通往文化的全球化。因此,当市场还不得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时候,不同国家相对于实力不同的竞争对手而言,对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人们还经常在使用文化还是使用暴力应对局面的问题

^①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42页。

上存在选择的困难。

现阶段的全球化具有一种历史地形成的三层同心圆的结构。首先,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结果,人在不断地觉醒,现代社会则给了更多的人以发展的机遇。个人在哲学上被叫做主体或个性,而在经济学、法学上被叫做财产权和个人权利。个人及其权利和尊严的觉醒是无法阻挡的,同时更加富裕的生活及生发的文化表达是人类无法抵御的诱惑。技术手段的持续改善,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小,竞争烈度不断提高。这时,如果没有良好的沟通意愿与沟通技巧,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对话就成为实现人际间沟通的最现实也是第一位的伦理准则。如今这些普遍的价值除了通过人们亲身感受地了解,也通过基于高效复制技术的全球媒体网络进行传播。当今世界在线即表达,表达即存在。全球化已经进入深度现代化时期。

其次,市场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应该说,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变化都是通过市场经济的环节实现的。历史已经表明,强调效率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具有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而等价交换是其能够大行其道的内在伦理准则。通过广泛的交换和遥远人际关系的建立,人越过了自然经济的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民族国家垂直等级体制的限制。在市场经济中,并非只有少数英雄可以出人头地。同时,市场似乎特别垂青技术,技术使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其数量级,反之市场竞争也支撑了技术的迅速进步。市场成了全球化最宽阔的实现平台。

尽管市场被经济学家中性地称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有种种“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例如,谋利动机可能造成贫富差别的增加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的迅速恶化。市场失灵的存在说明单有市场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府公共服务这只“看得见的手”予以援助。然而,市场大于国家。全球化局面下跨国公司的出现已经使各国政府对企业和经济的监管变得困难,而不同国内市场合成的全球市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管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近年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让全世界感到恐慌。

在对全球治理的期待中人们很难指望联合国。而根据市场进程,那些通过竞争占得先机的国家往往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且还会进一步制定或改写游戏规则,以确保其未来的利益。在20世纪后半期,美国无疑成为大赢家。美国还倚仗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挟持着联合国,它更像事实上的世界政府。美国对全球化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因此,第三,世纪之交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有专家说,美国的权力“比起纯粹由赤裸裸的强权所确保的要大,然而比起由完全合法的权威所保障的要小”^①。然而“9·11”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的反恐战争让人们看到,美国的实力独大局面并没有大到可以单独统治世界。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全球化是一个特定的互动与融合过程。全球化的上述三个层面相互叠压、交错推进,形成复杂的各自演化、相互影响的线索交织。三个圆形半径递减,现代化影响最大,历时最长。现代化尤其是它那些启蒙的特征和表达在当代社会处于边缘和下层的位置,但同时它也发挥某种基础和定向的作用。市场化不断扩张,逐渐向全球市场格局演进。美国化则是时间相对较短的趋势。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研究认为,美国在1945年开始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已经于1967—1973年间从巅峰状态转为走下坡路。反过来看,美国化占据了市场化的中心,市场化占据了现代化的中心(冷战结束后尤其如此)。市场为现代化提供动力,也易于使现代化进程产生某些偏向。美国希望控制市场,既为本国经济谋求利益,也为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某种稳定的局面。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与这样的利益结构打交道,必须能突破美国的影响和市场的局限,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美国的优势、市场的优势,最终都是由于现代化的承载。因为对美国和市场的怨恨而拒斥现代化,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全球化这三重叠压和变化合在一起,对相对于全球化有着特殊位势的各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和要求,启动了各自“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复杂进程。

全球化格局下,各民族国家的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开放市场,减少行政干预,放弃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集中力量对市场及国际贸易实行宏观调控。同时也与市场进行持续的博弈:向市场收税,以此滋养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民主化,培育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这种双向的嬗变会使各国社会变得更理性,更和谐。

全球化进程也使文化的作用变得更突出。所谓文化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大众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要求能超越或者兼容不同意识形态、文明、民族、宗教的对话格局。对话、协商变成国际关系常态,人们必须有所表达。失语症不仅意味着甘拜下风或者放弃,而且可能被逼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事实表明,无论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还是国际政治冲突的化解,最终都是要能够提供一套道义的论证。这种道义原则必须是基于双赢结局的,因此必须比以往的价值观具有更强的普遍性。这套道义论证也是需要不断接受检验的,以赢得信任。于是更多艺术性的表达变得不可或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国家需要有自己更清晰的、应对全球竞争的文化发展战略。

我们这样看待全球化,就能理解为什么和平与发展一样,是当代世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和平靠文化来营造。主张和平,不等于否认竞争,否认竞争就会有失利的可能。但我们也变得坚韧,百折不回。具有这样的精神才会将所有的挑战都看作新的机遇。

二、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竞争格局使每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都最终指向文化,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甚至凸显了文化发展战略形成的紧迫性。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处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都是不能回避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必须能满足双重的目标:其一是推动自身文化表达的繁荣;其二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通过推

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改善整个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这既需要我们的政府对文化发展的特性有更清醒的认识,也需要运用恰当的政策工具调控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 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人均GDP大大超过2万美元,正走在丰裕社会或者通往“后现代”的路途中。欧洲人常以整个欧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感到骄傲。欧洲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遗产,又有着民主的社会体制和自由的文化氛围。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但在全球化格局下,欧洲各国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对其文化的挑战。欧洲一体化进程令世人瞩目,在眼下的经济危机中,欧盟在应对南欧一些国家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和整个欧洲经济衰退前景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欧洲认同倾向,经济危机中文化还是发挥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欧洲的文化毕竟不是一个整体,在欧洲之下是几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在世界上的使用人口非常有限,因此,主要由不同语言负载着的欧洲各国的文化产品市场规模过小,无力与美国的文化产业、风靡全球的美国文化产品抗衡。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为由若干亚文化构成的欧洲文化“组团”打响了“保卫战”。

战略的重要性表现为犀利的前瞻性。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关注文化发展问题,纷纷制定国家文化战略。1990年,英国政府要求大英艺术委员会协同英国电影协会及各地区行业委员会共同起草本国文化发展战略;1992年形成了“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讨论稿;1993年“首次以官方文件的方式颁布”了这份题为《创造性未来》的国家文化战略。英国的文化战略制定也影响到其他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几乎是同时(1992年)启动了文化战略制定工作。1994年,该国以《创造性的民族:澳大利亚联邦文化政策》为题推出了国家文化战略。^①这样一些文献不仅明确了欧洲各国推动文化发展的政策意向,甚至模塑了欧洲国家文化战略的文本样式。2003年,芬兰政府制定的《芬兰文化政策》,在框架上与此前分别推出的英、德、法等国的文化战略文本一样,都是由文化政策历史回顾、管理机构及决策机制、文化政策总目标、现行政策的发展及争议、主要法律条款、财政对文化的支持、主要文化机构的地位及合作关系、国家对创造性和公众参与的支持等部分组成。于是,欧洲各国制定的文化政策也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战略。

欧洲各国的文化战略文件都对文化及本国的文化特质进行原则界定,但对国别文化特质的界定并没有表现出传统主义或与相邻文化绝对切割的倾向,而是表现出一种迎接民族文化创新、接受民族文化认同、不断重新锻造的开放姿态,一种努力打造多样的全球—地方化文化格局的倾向。作为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战略文献《创造性的民族》就强调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化创造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既要反对“狂热的亲英

^① 《创造性未来》应该译为《创意未来》,而《创造性的民族》应译为《创意民族》。

情绪”，又要反对“粗暴的本土沙文主义”。于是这些文化政策或文化战略在高度一致地强调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也高度一致地强调对艺术原创的支持，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进行理智应对等。近十多年来，几十个欧洲城市还先后启动了创意城市网络构建行动，推出了以《创意欧洲》为题的政策调研报告。现在这些文化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似乎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升。

美国在传统上不强调对文化的国家庇护政策。美国的“文化立法”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宪法对立法机构的权力都进行约束，更不要说对政府行政的授权了。但美国的州立法会议在2002年也公布了一份文化政策报告《文化投资：各州的政策创新》。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份经济学视角的报告，关注的是文化投资，但它特别强调了新时代里“新经济”的意义，主张推动“创造性产业群、创造性劳动力和创造性共同体”的发展。这里，我们尤其应注意该报告对“创造性共同体”形成的强调。所谓共同体就是社区，但同时包括了都市、城镇和乡村，它的着眼点落在了全体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文化价值的传播上。这份报告的结尾部分引用加拿大议员的观点说明：“文化并不是一种产品。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只有那些深信自己的文化不会受到威胁的人，才是更加强大、更加自信的公民。这种自信有助于人们树立对他人的宽容与尊重。在我们的一生中，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重要的目标。”这种多少带有民间口吻的表述把政府的政策目标揭示得淋漓尽致。

在这样的趋势下，一些中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甚至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自己的文化战略。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香港、台湾，东欧一些“新欧洲”国家与俄罗斯都不甘其后。在这个潮流背景下，法国等国家更是主导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一项国际公约的制定。除了大批发展中国家，若干欧洲国家也对全球化进程持保留态度，其焦点就对准了国际文化贸易的不平衡，对准了美国在全球文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围绕世贸组织服务贸易谈判，“文化例外”的口号被提出来。“文化例外”的讨论转移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有了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然后是2005年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些国际法文件，都强调民族国家有对国际文化贸易采取特定政策措施的权利，也强调了对濒危文化表现形式保护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2005年的《公约》迄今已得到120多个国家的支持和批准。应该说，欧洲国家的文化战略正成为世界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范例。

（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整合公民价值重估，促进公民创造性表达

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都是不可缺少的。所谓“文化软实力”更是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共同价值观。但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制定并不是简单地指定某些意识形态规范或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理解现代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式，也需要理解前现代民族在向现代民族转变过程中会面对的一些共同趋势，而且要学

会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引导文化发展。一般来说，当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对三种文化思潮。新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三种思潮的涌动、拍击、交汇中被锻造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都还没有完成，但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三步并作两步走”，兼顾“后现代”的发展与文化发展趋势。我们不断地讲，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是被放在现代化、世界和未来即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来憧憬的。我们在文化发展上缺少历史经验，但今天我们必须处理好文化发展的新课题，必须通过对话、沟通和协调主导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变革。

这三种文化倾向中最主要的一种是价值重估。驶入现代化快车道国家的文化表达必然会面临对传统的、前现代的文化价值的重估。人类对一个知之甚少的世界，总是试图予以有常的解说。人们的世界观当中其实有两种基本成分：一类是经验事实；另一类是主观的综合。世界曾在漫长的年代里几乎没有多少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发展开始提速。当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时，人们眼中的世界的事件—背景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以前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了，一些本来没有注意到的事物突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一些长期以来顺理成章的事变得不能被容忍了。这就是世界观变化的开始。继而纷繁的经验世界需要用新的尺度予以重新丈量和解释。价值重估就是解释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尺度的变换。如同近年的中国东部地区，不少地方的民营企业职工，在进入企业时与之签订了劳动及报酬合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盘剥。因为他们来之初，那个报酬期待是与在原籍的收入相比较存在的；而后来，他们看到了发达地区人们普遍的工作状况和报酬待遇，心里有了一个新的标准。因此他们会要求增加工资，并推动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财富总量在增长，民众的收入在提高。但在大量涌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社会变得极其不人道，人类的前景变得暗淡。这除了有一些传统主义者以旧道德衡量新世界之外，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在勾勒新的道德规范。西方各国的中世纪，没有多少艺术作品出现。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乃至整个近代史当中，由于人的觉醒而涌现出大量的艺术精品；在20世纪到来以后，从事艺术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使得艺术的标准甚至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些惊世骇俗的种种现代主义、先锋前卫作品竟然慢慢地被世人认为司空见惯，一时间，怎样才可能再“新”成为了普遍的问题。

在所有价值观的变化中，社会伦理观的变化是首位的。今天，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家庭关系基础上的伦常关系已经无法有效规范市场交易实践了。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观更多地被以“平等”为核心的伦理观甚至权利观所取代；传统文化中更强调内心真实意义上的“诚”的观念正在被强调人际间相互约定的诚信观念所取代。这是因为，一个不断扩大疆域的全球统一市场正将所有人的家庭生活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今天，我们的确需要重新确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看来，社会公正意识更像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观的探讨和追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不断发展、艺术不断